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3.006

沈有鼎意义理论探赜

谷成城¹,金立²

(1.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2.浙江大学 哲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意义理论是现代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的核心议题。沈有鼎从佛教唯识学认识论出发,借鉴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对汉语表达式的形式结构以及意义和真值作了具体的论述,形成了系统的意义理论研究体系。在对语言、思想和对象三者关系的讨论中,沈有鼎为其唯名论立场进行辩护。沈有鼎的意义理论不仅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语言哲学发展中具有超前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解决空专名疑难等当代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以及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方面,仍具有重要启迪价值。

关键词:沈有鼎;意义理论;唯名论;汉语哲学

中图分类号:B81-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3-0042-08

沈有鼎(1908—1989)是现代蜚声中外的逻辑学家,他一生治学严谨,博采众长,是20世纪中国逻辑学界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人物。沈有鼎长期致力于汉语哲学研究,曾经计划写作一部《意指分析》,探讨如何运用汉语的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对西方哲学的核心议题——意义理论进行系统的阐述。据美籍数学家、逻辑学家王浩于1951年在《符号逻辑》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所述,《意指分析》是沈有鼎有关意义理论的一部专门著作,第一章为《语言、思想与意义》,主要论述辞身与辞、思想作为与意念、意指对象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为《意义的分类》,主要探讨如何按照意义对思想作为、意念以及辞这三者进行分类。第三章未见原作,但1975年沈有鼎在与王浩的通信中提及了其大致内容:“(第三章)主要为了说明‘自我中心词’和专名的性质。”^①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研究成果未能如“沈有鼎悖论”、《墨经的逻辑学》那样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巨大的反响,但随着当代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的发展,沈有鼎意义理论的价值愈益得以显现。本文拟以上述文本的分析为中心,尝试阐明沈有鼎意义理论的思想来源和完

整架构,并呈现其对当代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一 沈有鼎论语言、思想和对象

意义理论一直是现代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的核心议题,其以语言为研究对象,揭示语言的意义以及语言同世界的关系,用以解决哲学重大问题。沈有鼎从语言世界、思想世界以及对象世界三个层面对语言进行分析,其主要思想如图1。

(一) 语言表达式与思想

沈有鼎认为,表现思想是语言表达式的本质,但并不是所有思想都可以成为语言表达式的内容。为避免“思想”这个词产生的歧义,沈有鼎用“思想”的内涵对心理现象做了限定,并指出只有主动的、理智的、抽象的且处于显意识中的心理现象才能够成为语言表达式的内容。

一方面,语言表达式的本质是表现思想。沈有鼎将“辞身”(语言表达式)区分为有效的辞身和无效的辞身。其中,表现思想的是有效的辞身,不表现思想的,例如“啊”和“嗯”等是无效的辞身。

收稿日期:2021-1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ZX018)

作者简介:谷成城(1990—),女,山西太原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逻辑哲学、逻辑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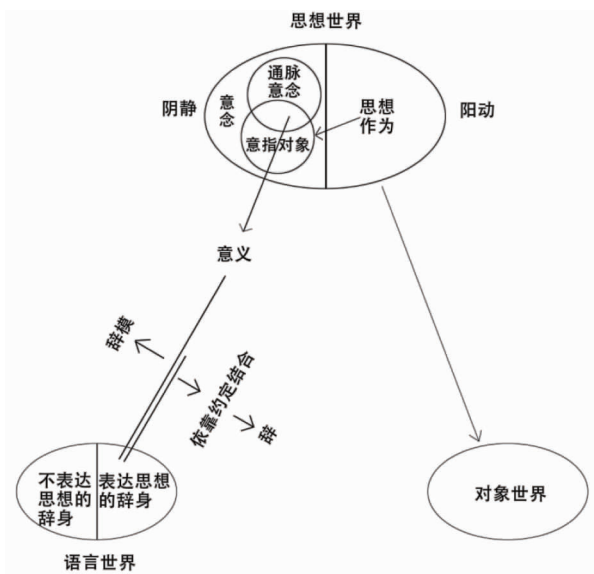


图1 沈有鼎论语言、思想和对象

另一方面,语言表达式仅能表现思想中理智的一部分。沈有鼎认为,仅有显意识范围内的、主动的、理智的、抽象的心理现象才可以被语言所表现(为简便,下文中所提到的“思想”即是指这种可以被语言所表现的显意识的、理智的、抽象的心理现象)。沈有鼎以行为与内容两方面为标准,将思想分为思想作为和意念。“因为人的思想不是纯乎阳动的,所以有他的阴静的一方面,这就是意念。”^①“思想作为”是思想之于对象的主动认识活动,“意念”产生于主体的认识活动,是思想作为的结果。例如:张三心中想着李四,“心中想着李四”便是思想作为,李四这个人本身便是思想作为的对象;张三心目中的李四并非李四这个人本身,而是思想作为产生的内容,即意念。只要有思想作为就一定会产生意念,并且,只有产生意念的思想作为才有意义。只有显意识中的理智的抽象的思想作为产生的意念,才可以被语言表达式所表现。可见,沈有鼎受到了分析哲学中“语义上行”方法的影响。他将思想世界和对象世界的研究转化为对语言的分析,只关注可以被语言所表现的思想。

(二) 语言、思想与对象

沈有鼎在对语言表达式进行分析时,极其重

视对思想世界的分析。这一点同唯识学和现象学重视意识层面是相似的,但沈有鼎从来不否认心外之物的存在。因此,他在对语言进行分析时,区分了意指对象和物指对象:“意指对象既可以说不是一个实际的事物,又可以说是一个实际的事物。”^②说它是一个实际事物,是说它“意指”一个实际的事物;说它不是一个实际的事物,是说它本身寄居在意念中,是心内的事物而并不在宇宙中实存。例如,张三心中想着女媧氏,对于张三来说,他想着的“女媧氏”没有实际对象与这个概念相应,但是有一个意指对象。这个意指对象仅存在于张三的意念之中,而非实际事物。但张三的确在想一个“实际的事物”,即与之对应的“意念”。按沈有鼎的观点,语言表达式不一定总有物指对象与它对应,但总是有意指对象同它对应。

总之,沈有鼎更倾向于从思想层面展开对语言、思想和对象三者关系的分析。在沈有鼎看来,语言本身并不直接同对象世界相关,只能通过思想世界同对象发生联系。在后续对语言的意义和真值的分析当中,沈有鼎阐明,意义和真值仅同思想中的意指对象相关,而同物指对象无关。

二 沈有鼎论意义与真值

在沈有鼎看来,虽然语言世界并不同对象世界直接相关,但只有理智的思想作为能同对象世界发生关联,且这样的思想作为只有通过成为意念从而被语言表达式所体现。因此,关于对象世界的研究也仅能通过对语言的分析进行,而面向对象世界的研究,则须凭借对语言的意义和真值进行分析才能达成。

(一) 辞、辞身与辞模的分别

A. 辞。“一个辞依靠着某些约定的存在而有。”^③

B. 辞身。“辞身是个别的物理事物。”^④

C. 辞模。“一个辞模是一个物理型式与一个意义的可能的结合。”^⑤

①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②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③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④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⑤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在这三者中,“辞身”所表征的是表达式的物理层面,它既可以是一串声音,也可以是文字表达式;“辞模”所表征的是同意义相关的层面;而“辞”是三者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因为“辞”是表达式的本质、意念的载体。荀子曾说:“辞也者,兼异实名以论一意也(《正名》)。”《孟子·万章上》中也提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可见,在汉语中,“辞”同文字表达式是有区别的。沈有鼎使用“辞”这一概念,正是借汉语的惯常用法说明,“辞”既不是语言表达式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也不是思想内容这种意识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的存在。沈有鼎认为,辞不是表达式,而只是表达式的内容,故一个辞可以有不同的辞身;辞也不仅是意义,当辞身和意义均相同时,如果“约定”不同,则二者的结合也将成为不同的辞。

(二)辞身的意义

沈有鼎是这样描述意义的:“一个辞身的意义并不是他所表现的意念或是通脉意念。……一个辞的意义也不是他所代表的对象本身。……一个意义不一定有对象本身与他相应。……一个意义不一定实现为意指对象。……意义不一定实现,所以一个意义的有并不依靠着思想作为,并不依靠着意念;而意指对象的有是依靠着思想作为,依靠着意念……凡是一个意义总是依靠着思想,依靠着心的;但我们并不是说他依靠着实际上的思想或实际上的心,他只是依靠着思想之所以为思想与心之所以为心,依靠着‘思想’这个性状。”^①可见,按沈有鼎的描述,意义既不同于表达式,也不等同于表达式所体现的意念或通脉意念。此外,意义也不等同于意指对象。意义虽然不依赖思想作为与意念而存在,却依靠着思想的“性状”。换言之,意义同思想相关,但不在思想之中。

首先,意义必须是客观的事物。思想中的事物都是个别的、心理的事物,因而不能成为意义。一个思想作为产生一个意念,意念虽然可以作为思想内容被语言所表现,但它并不是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意念只有脱离了个别性和私有性才能成

为意义,因此思想内容不是意义。

其次,意义同思想内容相关。沈有鼎认为,思想内容虽然不是意义,但意义的“有”是依赖于思想内容的。沈有鼎用“意念习”“通脉意念”“重唤”“意指对象”这四个概念说明,思想内容是如何脱离个别性而成为意义的。沈有鼎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意念习”,这是一个储存意念的半物理半心理的结构^②。思想作为产生意念之后,即被储存在意念习当中,在适当的时机可以被“重新请出”。例如:

A.张三思考“太阳”是什么。

B.李四问张三“太阳是什么”。

C.张三向李四讲述“太阳是什么”。

在这三个场景中,张三相当于对太阳这个客体进行了三次思考。在A场景中,张三在认识太阳时的思想作为产生了一个意念。并且,当认识太阳的思想作为停止时,相应的意念即进入了意念习加以储存。如果缺乏重唤的契机,该意念便成为私有的事物而不被语言表达给外界。在B、C两个场景中,共产生了两次“重唤”先前储存于意念习中的意念之契机。然而,“重唤”并非原封不动地把旧意念从意念习中请出来,而是要对旧意念再次进行思想作为,从而逐步产生多个新的意念。在B、C两个场景中,每一次关于太阳的思想作为所产生的意念均不同,但新、旧意念之间显然存在着相似性。正是因为这种相似性,意念才得以在人际间传递。沈有鼎将这种具有相似性的内容称为“通脉意念”。通脉意念使得意念因具有了客观性而具备被“传习”的可能性。

通脉意念在传习的过程中,产生了“意指对象”。所谓意指对象,即指意义所指向的对象。在胡塞尔那里,与之对应的概念被称为“意义相关项”。沈有鼎在1975年写给王浩的信中谈到:“按传统的看法,说到思想,就牵涉六方面的问题,即主体、官能、行为、内容、态度、客体。内容可以指思想内容,也可以指实在或实际内容。思想内容是广义下的概念,亦即胡塞尔所谓意义(Bedeutung)^③。实际内容可以指‘限制’于思维行为中的思想内容,

^①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147页。沈有鼎原文一直使用“他”指谓辞及辞身与辞模,依现行规范用法应改为“它”,引文仍照原文使用。

^②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③沈有鼎文集中原文为(bedeutung),应为误排,此处使用德文正确的拼写。

也可以指一种由通常称之为‘心思’的思维行为产生的现实的实体。胡塞尔只假定前者,不假定后者。前者在我的论文中称为意指的对象,……总之这是胡塞尔的 Noema。”^①可见,沈有鼎自己已明确表示,“意指对象”对应于胡塞尔提出的“意义相关项”(Noema)。沈有鼎也将意义同意指对象紧密联系起来,并认为意指对象脱离了个别性就是意义。例如:

- A.张三想着“女娲氏”。
B.张三向李四描述“女娲氏”。
C.李四想着“张三描述的女娲氏”。

在这三个场景中,女娲氏这个概念均无任何物指对象,但均分别有一个意指对象。因此,这三个场景中的意指对象均为个别事物。然而,按前文分析,在对三个场景的转述中,将会在语言中涌现出一个客观的意义。由此可得出结论,意义来源于脱离了个别性的意指对象。

(三) 辞的真值与效力

传统的真理符合论认为,与事实相符合的命题是真的,与事实不符合的命题是假的。然而,传统的真理符合论面临一些困难,例如,如何说明命题和事实的对应关系;如果句子的主词是一个空词项,那么如何判定这个句子是否有相符合的事实等等。沈有鼎在语言观上持唯名论立场,从他对语言的分析来看,他不赞同早期维特根斯坦“语言与世界同构”这样的观点。为了尝试解决传统的真理符合论面临的困难,沈有鼎分别从真值和效力两个层面对表达式进行了分析。

沈有鼎认为,真值的承担者是“辞”,而不是句子本身或对象本身。因此,沈有鼎以汉语为研究对象,将对真值和效力的讨论建立在对“辞”与其“意指对象”“物指对象”间关系的分类讨论基础之上。因此,沈有鼎对整全的辞——可以独立使用并传达一个完整意念的辞进行了分类(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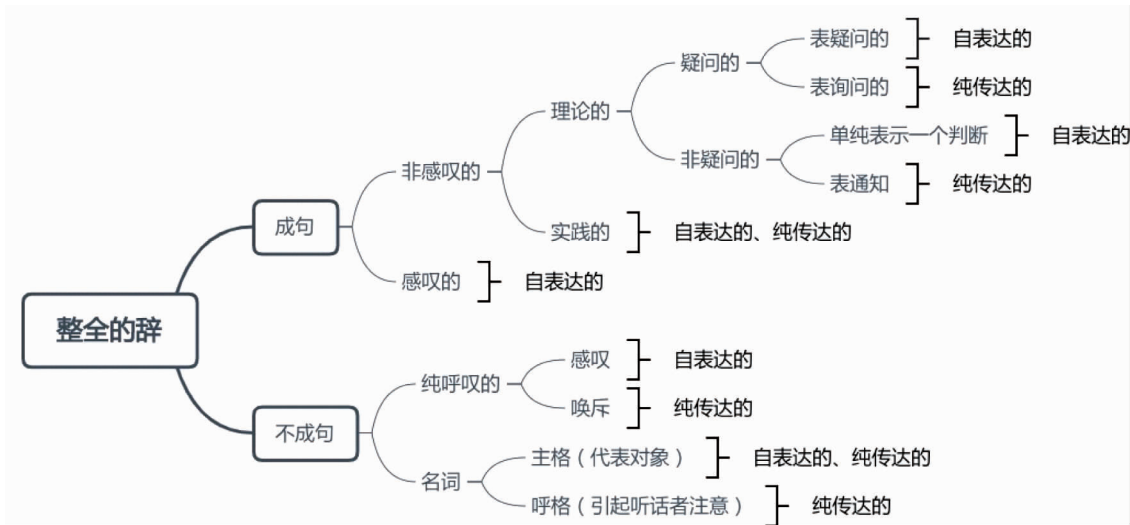


图2 整全的辞的分类

在这些分类当中,沈有鼎认为,只有不成句当中的“主格的名词”以及成句当中的“理论的非疑问的辞”这两者传达的意念是涉及断定和知识的,故而具有真值。沈有鼎分别对这两种表达式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并提出了真值问题和效力问题。

1. 真值问题

在传统真理符合论中,符合事实的命题称为真命题,反之则称为假命题。沈有鼎使用真

(true)和妄(fake)来刻画一个辞的真值,而非“真”与“假”。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一个“辞”(命题)的真值并不是由它所指称的事实或事态来决定的,而是由是否有相应的意指对象决定的。

一是主格的名词。主格的名词可以体现一个完整的意念,这个意念就是一个实际对象的代表。例如:“女娲氏”“孔子”“珠穆朗玛峰”,这三个主格的名词都可以传达一个完整的意念,但他们并非都有意指对象和物指对象与它们对应,“女娲

^①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1—552页。

氏”有意指对象,但没有物指对象;“孔子”和“珠穆朗玛峰”都既有意指对象,也有物指对象。

一个主格的名词只要有意指对象,就是真的,反之则是妄的。沈有鼎认为,虽然主格的名词不一定都有确定的实际对象与其相应,但均有确定的意指对象——要么是对实际对象的摹写,要么是抽象性的范畴概念。因此,所有的主格的名词都有意指对象与其相应,因而无所谓真妄。

二是命题性的“辞”的真值。对于非理论的、非疑问的成句的辞,沈有鼎将其称为“命题性的辞”(以下简称“命题”)。此类辞所表达的意念是对某个事物之性质状态或某几个事物间关系的认知。按沈有鼎的思路,当我们谈论命题的真值问题时,命题的真值便同意义关联起来,而意义又同由思想作为产生的意念关联起来。“命题性的意义与命题性的对象(事实或是道理)是必须区别的。前者有真有妄,后者无妄无真。一个命题性的意义若是有一个命题性的对象与他相应,他就是真的;若是没有,他就是妄的。”^①其中,命题性的对象是指,将命题所描述的事实作为一个对象,则命题性的意义即命题所体现的意念内容。例如以下三个命题:

A.4 是偶数。

B.“4 是偶数”这个意义。

C.“4 是偶数”这个事实。

按传统真理符合论的观点,句子 A 是命题,B 和 C 则是名词。句子 A 的对象是 C,如果句子 A 与这样的事实相符合,则是真的,反之则是假的。

但是沈有鼎认为,像“4 是偶数这个事实”不是一个实际的物理对象,因此是不能作为句子 A 的对象的。句子 A 的对象只能是数字“4”,而不可能是一个事实。所以,句子 A 是没有物指对象的,只有一个意指对象。一个命题的意指对象就是一个命题性的对象,一个事实或者一个道理。因此,“4 是偶数这个事实”就是句子 A 的意指对象。

沈有鼎认为,一个命题的“真”与“妄”,取决于是否有一个物指对象与其相应。本文认为,这里的“相应”是指,如果一个命题的意指对象有物指对象,那我们就说这个命题是真的,反之,该命题就是妄的。因此,如果名词 C 有物指对象,就

是确实有这个事实,那么句子 A 为真,反之,句子 A 为妄。

例如以下两个命题:

D.4 是奇数。

E.4 是偶数。

句子 D 的意指对象是“4 是奇数这个事实”,句子 E 的意指对象是“4 是偶数这个事实”。句子 D 的意指对象没有物指对象,而句子 E 的意指对象有相应的物指对象。所以句子 D 是妄的,句子 E 是真的。

2. 效力问题

除了真值问题,沈有鼎还讨论了效力问题。一个命题的效力是与该主词的使用方式及该主词是否有物指对象相关的。

一是主格的名词的效力。主格的名词是没有真值的,但它依然可以有效力。并且,主格的名词的效力同命题的效力相关。沈有鼎使用根谬(groudless)一词来指称没有物指对象的名词,例如“女娲氏”“1925 年法国国王”等;非根谬则是除根谬以外的一切名词。凡根谬之名词,皆无效;凡非根谬之名词,皆有效。

二是命题性的“辞”的效力。根据一个主格名词在句子中的作用,决定一个命题的效力。如果一个命题的主词有物指对象,我们就称这个命题是有效力的。如果一个命题的主词没有物指对象,则该命题是否具有效力对应两种情况——当这个主词作指定名词用时,该命题无效力;反之,则该命题有效力。

例如:

A.女娲不一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B.女娲是个男人。

句子 A 不假设女娲一定有物指对象,这时“女娲”就不作指定名词用,我们称这样的名词是非根谬的名词。句子 A 中的主词“女娲”是非根谬的,因此该命题是有效力的;句子 B 假设女娲有物指对象,先有了这个物指对象才能断定它是男是女,所以女娲在这个句子中就作为指定名词使用,我们称这样的名词是一个根谬的名词。由于句子 B 的主词是根谬的,因而这个句子是没有有效力的。

综上所述,沈有鼎认为,一个命题的真值同表

^①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8 页。

达式的意指对象相关,效力则同其物指对象相关。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沈有鼎进一步探讨了一个证明的有效性问题的,一个证明的有效性既同命题的真和妄有关,同时也同命题的效力有关。可见,沈有鼎对于概念、命题、证明的真值与效力均做了系统且全面的分析。

三 沈有鼎的唯名论立场

在 20 世纪语言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中世纪那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已经转化为一种对语言层面的讨论,并且产生了唯名论语言观和实在论语言观的争论。以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从概念的外延入手对语言进行分析,将语言的真值同对象世界相关联,形成了实在论的立场,影响极为广泛。中国学界早期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受实在论的影响较深,因此在对语言、思想和对象三者关系进行说明时,沈有鼎的许多观点都带有实在论的色彩。例如“一个通性概念所根据的是‘性’(Essence),这性底没有是不可设想的……宇宙间尽可以没有马,但‘马性’是不会有‘没有’底可能的”^①。但是,沈有鼎在同王浩的通信中解释到,这样的实在论的写法,是一种适应清华哲学系的策略^②。由此,本文认为沈有鼎的《意指分析》实际上始终在为其唯名论的立场进行辩护。

(一) 唯识学的认识论对沈有鼎的影响

沈有鼎精通梵文,对唯识学以及因明学都保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同熊十力书信探讨唯识学的相关问题。在同王浩的通信中,沈有鼎提到:“后几章如果写出来,我的唯名论立场会越来越显著,因为我当时确实受佛教徒唯名论的影响。”^③综合沈有鼎的研究背景,本文认为沈有鼎所谓佛教徒唯名论,主要是指佛教中的唯识学。

唯识学起源于印度佛教,后由玄奘和窥基引入中国。因其教义深奥晦涩难懂,未能产生大的影响。唯识学因剖析事物的相对和绝对真实,且强调心外无独立之境,故称唯识宗。20 世纪初,中国哲学学界重新重视对唯识学的探讨,熊十力等学者均将胡塞尔现象学同唯识学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可通约之处,这正是沈有鼎

开展唯识学研究的背景。

沈有鼎对思想和对象关系的探讨同唯识学有很大相似之处(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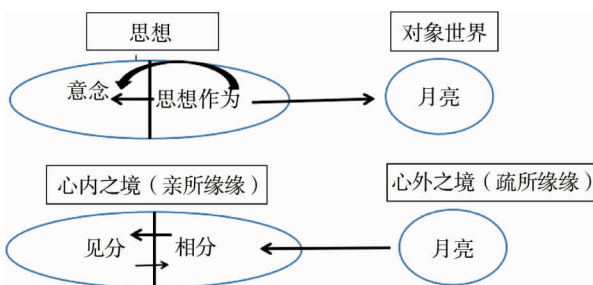


图 3 沈有鼎认识论与唯识学认识论对比

作为大乘佛教的分支,唯识学十分注重对阿赖耶识的探讨。意识一动,即生二分,即相分和见分。按此,当人观月时,月亮作为外境对阿赖耶识的相分产生作用,形成一个镜像,见分则对这个相分进行观看形成认知。因此,内、外境的月亮分别是见分的亲所缘缘与疏所缘缘。在对思想和对象的探讨中,沈有鼎便借鉴了二分的认识论。沈有鼎的讨论同样以人观月为例,并认为,在思想的阳动方面对月亮观看的同时会产生一个意念——月亮的镜像。之后,这个意念储存在意念习当中,在思想作为数次对意念进行观看的过程中,认识主体逐渐产生了通脉意念,并获得了月亮的认知。可见,存在这样的对应关系:“思想”与唯识学的“阿赖耶识”相对应,“意念”与唯识学的“相分”相对应,而“思想作为”则与唯识学的“见分”相对应。在对意识和对象的探讨中,沈有鼎也在唯识学认识论的影响下,对人的认识能力二分,并且进行了重意识层面而轻对象层面的探讨。笔者认为,这一轻重之间的选择,直接决定了沈有鼎唯名论思想的主要来源。在这样的唯名论思想指导下,沈有鼎认为,对象世界并不是同语言所一一对应的,因此,普遍概念、带有量词的名词、关系谓词等均只有意指对象而无物指对象。

(二) 胡塞尔意向性理论对沈有鼎的影响

沈有鼎对意义理论的探讨曾引起靳希平和倪梁康的关注。靳希平和倪梁康均从王浩与沈有鼎的通信内容中,发现了沈有鼎与胡塞尔之间学术上的关联——沈有鼎意义理论的主要核心概念以

①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3 页。

②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51 页。

③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51 页。

及理论框架均同胡塞尔有对应之处。通过考证,他们认为沈有鼎与胡塞尔应该有过直接的接触,因此二人认为,沈有鼎同胡塞尔在学术上有着实际的师承关系,并且胡塞尔的现象学对沈有鼎的逻辑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根据沈有鼎1974年在与王浩的通信中所说:“我强调的是,先验论正日益变得更不可信(我是指康德或胡塞尔类型的先验论。)”^①“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不能按精确科学的方式来谨严地阐述。……无论如何,但这点上,我们似乎不能跟胡塞尔走了。”^②可见,沈有鼎更为欣赏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至于胡塞尔中后期的研究,沈有鼎并不是很认可。在沈有鼎同王浩的通信中谈及胡塞尔时,对其评价也多为负面的,认为胡塞尔是一个极端的唯心主义者^③。

实际上,《论表达式》一文是沈有鼎于1931年在美国写作的,文中的许多观点是在未与胡塞尔接触前就与其不谋而合了。可见,沈有鼎在当时就已经同以实在论为基础的逻辑分析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分歧。1931年取得硕士学位后,沈有鼎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访学,曾旁听过海德格尔的课程。从沈有鼎1974年与王浩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出,沈有鼎同胡塞尔的确有过一定程度的接触。归国后,沈有鼎曾开设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专题课程。据称,“Epoche(悬搁)”这个核心概念的翻译还是由沈先生确定下来的^④,可见沈有鼎对胡塞尔的研究工作是十分熟稔的。在熟悉了胡塞尔的著作之后,沈有鼎对自己的意义理论进行了相当大的改动。通过前两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到沈有鼎使用的许多核心概念同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论表达与含义所使用的概念之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例如,沈有鼎的“意指对象”“意念习”“通脉意念”“重新请出”分别明显地对应着胡塞尔的“意义相关项”“观念结群”“可感受的相似性”“重唤”。

我们决不能因为二人核心概念的相似性较大,而忽视二人在这些概念的使用目的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而这一重要差异则直接导致二人的理论框架存在显著区别。例如,沈有鼎借“思想

作为”来说明认知主体通过意向性的认知行为产生的意念,并在语言行动中呈现出可传达的客观的意义。而胡塞尔则借“意识行为”说明指号如何联系起两个并无逻辑关系的事物,并通过悬搁对象来达到纯粹客观的意识行动。但是“胡塞尔所诉求的可以脱离主体的纯粹客观的意识行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实际存在的是主体的心智行动”^⑤。沈有鼎十分不赞同胡塞尔这种先验论的分析方式。因此,胡塞尔的现象学为沈有鼎所提供的思想来源,更多的是从意识层面出发对表达与含义的分析,而非其现象学思想。也就是说,对于胡塞尔语言哲学的研究,沈有鼎是十分认同的,但并未接受其现象学还原的哲学研究方法。

(三) 日常语言学派对沈有鼎的影响

1929—1931年,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沈有鼎在谢弗和怀特海的指导下开展逻辑学研究,尤其对现代逻辑进行了深入考察。归国后,沈有鼎发表的两篇文章——《初基演算》《不依赖量词的部分的纯逻辑演算》,是对谢弗研究工作的继续拓展。20世纪初正是英美分析哲学兴盛之时,沈有鼎的留美求学经历为他奠定了扎实的现代逻辑技术功底。1945年,沈有鼎赴牛津大学访学,并参加蒲莱斯研究班。当时正是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兴盛之时,因此沈有鼎对语言、思想和对象三者间关系的分析,同日常语言学派有许多相似之处。

沈有鼎的语言分析方法不是语法结构分析,而是与斯多葛学派的Lekton更加相似的语义分析。一方面,汉语不同于西语的语言结构特征,较大地决定了沈有鼎语言分析方法的选择。西语以主谓式的语言为主,但汉语因其语法结构多变、语序以及量词对句义影响重大,不适合做语法上的分析。另一方面,受到当时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沈有鼎注重对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进行语用、语义层面的分析,而非注重将其转化为精确的人工语言。所以,在沈有鼎的叙述中,我们往往能够看到“不符合日常说话的习惯”“照它实际的用法”这样的表述。

受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沈有鼎的语言观也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唯名论色彩。首先,沈有鼎认

①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4页。

②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8页。

③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页。

④梁志学:《摹物求比——沈有鼎及其治学之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⑤张建军:《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构图》,《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

为,语言表达式与意义的关系是由于“任意的约定”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辞依靠着某些约定的存在而有”^①,体现出强烈的规约主义色彩。即,不同语言的语法是由约定俗成而来的,语用制约语法,而非相反。其次,对于心外之物与心内之物的实在性,沈有鼎都是承认的。因此沈有鼎认为,意指对象虽然不是一个实际的事物,但却“意指地”是一个实际的事物。最后,沈有鼎拒斥“类”“序”等抽象概念的实存性。他在同王浩的通信中说道:“对于两个感性材料 a 和 b 我们注意到在网上 b 继 a 之后‘给出’,但 a、b 之为在所述次序下相继虽是外在于 a 的,也许也是外在于 b 的,却仍然是内在于 a 和 b 的。这些话可以认为是在真正的哲学意义上为‘唯名论’辩护。”^②因此,在沈有鼎看来,像“序”这样的二元谓词、抽象概念,虽然不内在于个体之内,但却内在于 a 与 b 之内,进而否认了抽象概念的实存性。

综上,受唯识学认识论的影响,沈有鼎对思想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于笛卡尔主客二分的认知,并且,受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影响,沈有鼎对语言、思想和对象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不过,沈有鼎虽欣赏胡塞尔现象学与唯识学,但他

对唯识学以及胡塞尔理论中不承认心外之物的唯心的成分深感不满。因此,他对唯识学和胡塞尔的语言哲学进行了一些整合。例如他的“思想作为”概念之提出,即是整合了唯识学对认识活动偏重的作用层面以及胡塞尔对认识活动偏重的行为层面,进而他提出了“思想作为”这个术语来称呼认识活动。此外,通过对汉语中日常语言的语义以及语用的分析,沈有鼎尝试回答语言、思想与对象三者间的关系,并为其唯名论立场进行辩护。

结语

沈有鼎对意义理论的研究,借鉴了佛教的唯识学和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在分析哲学语境下对汉语的表达方式、意义及真值和效力进行分析,突破了传统中国哲学研究往往停滞在对经典的校勘和诠释中的困境。沈有鼎有关意义理论的研究不仅在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中具有超前的理论意义,对于解决空专名疑难等当代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以及在当前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方面,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值得做进一步深度挖掘。

An Exploration of Shen Youding's Theory of Meaning

GU Cheng-cheng¹ & JIN Li²

(1.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ory of meaning is the core issue of modern philosophy of logic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tarting from the epistemology of Buddhist and drawing on Husserl's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 Shen Youding made a specific discussion on the formal structure, meaning and truth value of Chinese expressions, forming a systematic research system of theory of meaning.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anguage, thought and object, Shen Youding defended his nominalism position. Shen Youding's research on theory of meaning not only has advance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ut also has important enlightening value for solving the frontier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logic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research, such as the problem of empty proper names, and providing new idea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for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philosophy.

Key words: Shen Youding; meaning theory; Nominalism; Chinese philosophy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7 页。

^②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51 页。